



耕耘与求索

——吕遵谔先生访谈录

◆ 吕遵谔（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 薛生（《南方文物》特约记者）

吕遵谔先生,1949年入学北大,1953年留任北大历史系考古专业,从事旧石器时代考古和古人类学的教学和研究。50多年来,吕遵谔先生一直从事旧石器时代考古的人才培养、发现和研究,辛勤耕耘和不断求索,在旧石器时代考古与古人类的发现与研究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年适逢先生八十华诞与从事考古教学与研究五十五周年之际,为此,南方文物编辑部特约记者对吕先生进行了专访,约请吕先生就自己的治学经历和研究心得,畅谈体悟和感想。我们以此作为庆贺与纪念,并以飨读者。

薛生(以下简称薛):先生您一辈子从事旧石器时代考古的发掘和研究,当初您为什么选择旧石器时代考古呢?

吕遵谔(以下称吕):在毕业的那一个学期,我们考古组的同学私下议论,今后自己愿意搞什么,也就是终身研究的方向是什么。当时我们考古组只有5个人,其中还有一位女同志。有两个人已经决定搞商周考古,有一个要搞新石器,还有一个无所谓。但是大家议论有一点很一致,那就是搞什么也不能搞旧石器,因为旧石器这门学科太古怪了,整天要在外面跑,要爬山,进洞,走沟,很辛苦。另外对外语要求较高,因为旧石器的材料不但要和国内的比较,还要和国外发现的比较。所以大家都说搞什么也别搞旧石器。当时我还年轻,也就是脑子发热,我说你们不搞我搞。旧石器是在大学一年级时张政烺先生给讲的,讲到周口店的发现很重要,也讲到7·7事变以后日本人怎么到周口店破坏,怎么迫害中国的科学家,还杀害了2名工人。当时听了很气愤。我想中国人为什么不能振作起来和日本人比一比呢?我那时就想着搞搞旧石器。在一年级我就和同学骑自行车到周口店参观,对周口店还是有一些了解和感情。我就这样搞了旧石器,从此以后再没有变化。尽管搞旧石器很艰苦,我也坚持下来。而且在以后的工作中有很大的收获,觉得搞旧石器没有搞错。所以我搞旧石器时代考古的思想很单纯,就是一时高兴,脑子一热就决定了,没有很深的想法。

薛:您是裴文中先生的学生,裴先生教书育人的方法使你终身受益,您曾说过师从裴文中先生是您一生之中最大的幸运。能否谈谈您是怎样在学习和实践过程中不断地提高自己

的专业水平。

吕 我1952年冬季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当分配工作时,我们填的志愿都是服从国家的需要。由于当时经济建设蓬勃发展,而考古工作人员很少,全国许多单位都争着要人,所以我在学校一直等到1953年3月,才落实了分配计划。两个人去了中国历史博物馆,一个人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另一个人去了首都博物馆,我则留校任助教。因为考古专业刚成立,所以各项课程都很缺人。根据工作的需要和个人兴趣,我被分配到史前教研组,并师从裴文中老师专攻旧石器时代考古学。

在这之前我就认识裴文中老师,因为建国以后文化部曾经举办过“劳动创造人”的展览,宣传劳动光荣、劳动创造世界的唯物历史观。该展览由裴文中老师主持,我们考古组五位同学都参加过展览会的工作,所以对裴文中老师的情况也有所了解。能作裴文中老师的学生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幸运。

1953年秋,我即脱产,到城内的地安门二道桥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研究室,也就是今天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前身,当时的室主任是著名的科学家杨钟健先生。因为裴文中老师曾在大学任教多年,在培养学生方面有一套方法,也很有经验。他帮助我制定了三年的学习计划,每一个学期都既具体,又很灵活。总的方式是在工作中学习,即从实践中学习。除了阅读参考书和作笔记以外,还参加室内举行的定期专家讲座,包括地质学、古生物学、人类学和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等。碰到田野调查或发掘,则临时修改计划,变通执行。

关于学习方法,老师认为因人而异,总的来说是要做到“四勤”和“四条腿走路”。“四勤”就是要脑勤、手勤、眼勤、嘴勤。脑勤就是要多想问题,对所遇问题进行思考和分析。手勤对于搞考古的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读书要做笔记,听报告要记录或把弄不清的问题记下来,通过读书、学习或请教别人解决问题,这些收获都是自己的。外出参观或进行田野调查也要多记录、多绘图,将别人间接的经验吸收为自己的经验。通过自己的手收集的文字、照片等资料,在日后的研究工作中将会派上大用场的。眼勤就是多看,多观察,如仔细地观察地层剖面,用脑思考其成因,观察石器的特征以及各种动物牙齿的区别。嘴勤就是要多问问题,向有经验的人或周围同行请教。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圣人尚且如此,何况我们一介草民呢?向人请教问题也不是很容易能做到的。从求知的角度解释,所谓学问,就是学着问问题。有的人不愿去问,是因为他放不下架子,这种人更不愿意下问;有的人是对某一问题真的懂了,觉得没有什么可问的;还有的人是根本没懂,所以提不出问题。在学习上应该多问几个为什么,如果你能把所问的人问倒,那是最好的了。“四勤”是有联系的,不能只用其一不用其他。采用这种学习方法会有很大的收获,而且记忆也能得到巩固。

所谓“四条腿走路”,是指要学习的四门学科,即地质学——尤其是第四纪地质学、古生物学——主要是第四纪哺乳动物学、人类学和旧石器时代考古学。这四门学科之间是密切联系的,不可能说学习哪一科最好,而是应该一样重视。举个例子说,野外调查和发掘时首先要认识地层,从地层的结构、特征和形成的原因来划分地层。对于地层中出土的动物骨骼和牙齿化石,要能够认识是什么动物,这样可以确定地层的时代,因为在一定的地质时期有一定的动物出现,例如肿骨鹿就与北京人共存,北京人以后,肿骨鹿就绝灭了。动物化石还可以研究当时的气候环境和古人类的生活和生产活动。认识了地层的特征和时代,就可以在发掘过程中掌握主动了。譬如发掘旧石器时代中期的遗址,那么就要注意,在这一时期可能出现墓葬。欧

洲一些遗址发现的墓葬可以早到旧石器时代中期或稍晚,而中国尚未发现这一时期的墓葬。假如发掘的是很大且深邃的洞穴,从试掘的地层和动物化石得知,这可能是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洞穴堆积。发掘时除了要特别注意墓葬等遗迹现象以外,对于洞穴的四壁也要进行极其详细的调查,看是否有雕刻的动物图像,即洞穴艺术。在法国和西班牙发现了很多这类令人惊叹的洞穴艺术,但是在中国却未曾发现过有洞穴壁画和雕塑的遗存。若有发现,必定具有相当重要的学术价值,不亚于新发现一个猿人的头骨!因此,学习古动物学对于发掘工作很有帮助。考古发掘本身就是破坏,若到室内整理时才发现问题,已是无法补救,造成很大的遗憾。

在指导我学习的过程中,老师不轻易正面解答你提出的问题,而是引导你通过观察实物或思考,自己解决问题,最后再作一番评论。我记忆最深的是对一枚动物牙齿的认识,虽然我知道这枚牙齿是食草类动物的,但不知道是何种动物。我就拿着牙齿去问老师,当时他正在写稿子,我说明来意,老师连头也没抬,只是从架在鼻尖上的老花镜后看了我一眼,然后看了看牙齿说:“我也记不清了,你到标本室去查一下,再查一下文献就好了”。其实老师知道这枚牙齿是什么动物的,用一两分钟的时间就可以解决我的问题。当时正是夏季,气温很高,我还穿着厚的工作服。标本室的动物骨骼标本十分丰富,但因为房间窄小,标本的摆放并不十分有序,找起来比较困难。有的标本没有经过彻底处理,骨表面还残存一层油脂,落有灰尘,拿的时候还会沾手。我找了一个上午也没有找到可对比的标本,还出了一身汗,满身油脂。下午继续找,还是没有结果。第二天上班后,我将查找标本的情况和结果向老师做了汇报,老师问:“门后的架子下面都找了么”?我回答说:“没有”。他又说:“为什么不找,找找去”。我很懊悔,当时为什么那么粗心,原本看到门后架子下面有标本,但因为懒并没仔细看。这次查找,我在门后架子下的一个木箱里面找到了一些动物牙齿,其中有两枚和我手中的完全一样,只是一左一右而已。这两个标本上面写着 *Camelus Linnaeus*,应该是骆驼的上臼齿了。我将结果告诉了老师。他笑了笑说:“学习要下苦功夫,没有捷径可走”。我请老师讲解一下骆驼牙齿的结构和特征,老师说:“你自己查书,我的书柜里都有,但不要弄乱了”。于是我又用整个下午的时间翻阅先生的图书和资料。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柜中有中、外文图书,按类排列,有地学、考古学、古生物学、文化人类学、体质人类学、植物学、科技、民族学、艺术等等,还有一本是老师著的关于钓鱼的厚书,图文并茂,因为先生对钓鱼情有独钟。我将手中的骆驼臼齿与参考书对比,得知是右上第二臼齿,但对其中一些学术术语似懂非懂。于是老师放下手头的工作给我做专题讲授,详细到骆驼的齿式,臼齿的构造及下犬齿特别发达的特征等等,甚至还给我讲了一些骆驼的生态。通过自己对资料的查找及先生的讲述,使我对骆驼牙齿的认识极为深刻,终生不会忘记。

第二天,我又得到老师的允许,把他书柜中和我学习有关的图书抄了一份目录,足有五六十种之多,这对于我以后的学习帮助很大。可惜这份珍贵的书目在特殊的年代里丢失了,十分遗憾。

第二天上午,老师找我,让我谈一下对这次学习的看法。我开始不很理解,并且有些情绪。本来几分钟就可以解决的问题,却让我花了整天的时间去标本室查对,又花了半天的时间去查找参考资料。但是后来我想明白了,这是老师让我在实践中学习,锻炼我掌握四勤的学习方法。所以在今后的查找标本中,我就很主动了,尽管花的时间多一些,但收获很大,而且记忆很巩固。具体的收获就是:第一,不懂的问题现在懂了;第二,了解到标本室的标本非常丰

富,知道了都有什么动物的标本,哪些是完整的,哪些是零星的,以及摆在什么地方;第三,了解到老师藏书的内容,也知道了他的分类和查书的方法;第四,知道了从实践中学习对初学者来说是最好的学习方法,应当充分发挥其作用。

我的老师裴文中先生,不仅是一位著名的学者,也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工作者。他为人谨慎,不轻易回答问题,而且是采取诱导的方式,让我们通过自己的观察、思考来解决问题。老师虽然不随便解答问题,但却好提问题。例如在讲课和做专题报告的时候,会冷不丁的提出问题,并指明道姓要求学生回答。不管回答的正确与否,他都先不表态,而是让其他同学评论回答的是否正确,或加以补充,最后老师才进行总结。这种方法对我的影响很大,我也学会了老师的这种教学方法,经常在课堂上提问。这样的好处是同学们务必在平时复习功课,以准备老师的提问,不要等到考试的时候再临时抱佛脚。

另外一点就是一一定要在实践中学习,这是一种很重要的学习方法。在野外调查时,他会随时从衣袋中摸出一块石片或一枚牙齿,问我们是否是石器。假如是,为什么是,若不是,又为什么不是。动物的牙齿是什么动物的,是哪一侧的,以及具体是哪一颗牙齿。对于路边比较复杂的地层剖面,就会要求大家观察地层,分析地层形成的原因和时代,绘出剖面图。工作休息时,老师就会席地而坐,结合周围的情况如河流、阶地、洞穴等系统地讲解。开始我们这些年轻人都很不习惯这种随时提问的方式,调查时主动和老师保持一定的距离,以避免被他抓住“强迫”提问题或回答他的问题。但后来我们发现这种方式对于检验学习和考核观察综合的能力大有好处,所以后来就主动围着老师,伴他而行,并积极提问题,老师会给予满意的解答。这样我们不仅学到了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还进一步了解了在实践中学习的重要性。

在50~60年代我先后参加了山西丁村、西侯度,陕西蓝田、北京周口店等旧石器遗址的调查和发掘,56年还参加了广西巨猿洞的调查工作,在工作实践中不断地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

薛:先生您在旧石器时代考古学领域中屡有重大发现,从沂源人、金牛山人、涑水人和南京人等一系列重要的古人类化石的发现,尤其是金牛山人的发现和以多处火塘为中心的金牛山人活动面的揭示,已经和正在改写我们对于中国远古人类直线演化发展的传统认识,使得多元复杂的中国古人类演化图景得以逐渐清晰。可以说这些珍贵的发现是您对古人类学和中国史前考古学研究的重要贡献。您能讲讲金牛山人化石发掘的情况和感受吗?

吕:根据教学的需要,1984年9月我和1位老师带领6名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生到辽宁省营口市金牛山进行田野实习。在实习过程中,考古发掘队发现了一具比较完整的古人类化石,发现的材料有头骨一个(缺下颌)、脊椎骨6个、肋骨2根、尺骨、髌骨、腓骨各一件、腕骨9件、左右侧掌骨各1件、指骨7件、跗骨11件、跖骨2件、趾骨13件。这些化石除了1件趾骨和1件脊椎骨是单独发现以外,其余化石都集中发现于距洞穴南壁约2米处,分布在1.6平方米范围内。从人类化石同在一个层面和化石颜色相同,且腕骨、跗骨等关节都能吻合连接在一起等情况判断,全部化石是属于同一个人的。根据人类化石的特点,认为她是一个大概20多岁的年轻女性,我们称它为“金牛山人”。和金牛山人同一地层还发现了很多动物化石,包括拟布氏田鼠、大河狸、沙狐、变异狼、棕熊、獾、最后剑齿虎、梅氏犀、犀牛、李氏野猪和肿骨鹿等。堆积的性质可以和北京周口店北京人洞穴对比。动物群也属于肿骨鹿-北京猿人动物群的常见成员。铀系法测定的年代为20-31万年。人类化石层位年代距今为26万年。金牛

山人的头骨保留了一些与智立人相似的原始特征,但具有更多的进步特征,属于古智人(Archaic Homo sapiens),但她却与晚期直立人生活在同一时期。这对于传统认为人类直线演化的理论提出了挑战,因而学术意义很大。

金牛山遗址的发掘方法很重要。这是一个洞穴遗址。地层堆积中有许多从洞顶塌落下来的大块岩石。这时若再采用方格法发掘就不合适了。因为什么呢?假如一块大石头正好掉在四个探方的中间,要把这块大石头取出,势必要破坏整个发掘面。所以我们没有采取方格法发掘,而是按自然层位发掘。这样可以揭露原始人类整个活动层面,了解遗物之间的关系,从而探讨当时人类的行为。

按层位发掘时,可以10-15厘米为一个人工层发掘,首先清剔出该层中所有的动物化石和石器等文化遗物,原地保存。然后用方格法定位,记录每件出土遗物的位子,包括器物编号、照相和绘图。处理完一个发掘层面以后,按自然层位继续向下发掘。发掘过程中对动物化石、石制品、烧骨、用火等重要遗物一般用小红旗插在旁边标志,以保证其不会被踩坏以及忽略。登记取标本的时候,详细记录每件标本的属性和位置以及发掘时间等。典型标本和重要的小件标本都要单独存放,比如小的可以用棉花包起来或放在试管中,专门保管。

含金牛山人化石的文化层,我们共分13个人工层发掘,在不同的层位共发现9个灰堆,一万多件动物碎骨,其中有大量鹿的骨骼是被人工敲击破裂的,还发现200多件石制品和烧骨。这些烧骨、石制品和人工敲击的骨片主要分布在灰堆附近。灰堆直径0.5~1米左右,由烧石、灰烬和烧骨组成。从遗迹现象分析,当时人类使用土、石封火,保存火种。我们在洞穴附近做了封火试验。从山上捡树枝和干草,燃烧后用石头和土封火,最长可以保存14个小时,扒开土石后保存的余火,用干草就能引燃。尽管以前已经知道北京猿人能够保存火种,但用什么方法来保存火种并不清楚。因而金牛山灰堆的发现对研究古人类的行为提供了重要的资料。从我们发掘的遗迹现象分析,可以推测当时有一小群古智人住在这里,他们白天出去采集和狩猎,将猎物带回洞里,围坐在灰堆旁分享食物。晚上住在洞穴里可以驱寒和躲避凶猛的野兽。

对于金牛山人化石的发现可以说具有偶然性,但是也有必然性。必然性就是最终总是要被人发现的,只是时间的问题。说它完全是偶然性也不一定正确。这就需要对人体骨骼、动物骨骼比较熟悉,能区分出人和动物、是人体的哪一块骨骼。有一个曾经发掘过金牛山的同志说,假如发现一个人的头骨我还认识,要发现这些小的手、脚骨骼就不认识,会当成动物的骨骼而忽略了。这说明我们平时要重视基础知识的学习,不然,当发现了人化石时可能因为不认识而给扔掉,这也是犯错误。

薛: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您就一直从事旧石器时代考古的教学工作,还先后为多所大学讲授课程和培养年轻师资。如今50多年过去了,先生可谓桃李满天下。先生培养的学生都已成为旧石器时代考古科研与教学以及文物考古事业的管理等领域的骨干力量。值得一提的是,先生为了教学,投入了大量精力来建设旧石器考古教学标本室,我们想请先生谈谈标本室的建设过程和心得。

吕:考古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教学要形象化,需要实物。最好讲到什么课,就用什么相关的标本和模型,让学生能够看到和亲手摸到这些标本,通过这样形象的教学,可以使学生的记忆巩固,另外上课也比较生动。从旧石器考古学的特点考虑,我们想要建立一个标本

室,大概有这三方面的内容。一个是人体骨骼标本,另一个是动物骨骼标本,再一个就是旧石器的标本。

先谈一下人骨骼标本的收集。我们最早收集的一批标本是在上世纪 55、56 年期间。当时西直门外、阜成门外一带还没有楼房,我记得那个时候正在搞建设,所以就要先把墓地给清理了。政府先登报限一个月让事主迁移骨架。因为那时我家在城里面,从家到北大要经过那一带,经常看到有工人在那里挖坑。工人把骨架收集起来放到小棺材里面,摆了好多。小棺材上面只是写明男女,姓名什么的都不知道,事主通过相关机构来领取。由于我当时讲旧石器考古课程,需要人骨架标本,可买又买不到,所以对这些很感兴趣。那时我经常到那里去看。刚开始只是在墓坑的上面看他们挖,有个老头负责,别人挖出来了,让他看是男是女,然后他就在棺盖上用粉笔写是男是女。我看了大约有一个多星期,有时看他鉴定的是错的,就说:“老先生那个不是男的是女的”,他说:“你还懂这个”,我就根据我所学习的人体骨骼知识解释。后来比较熟了,我就下去帮他清理。我问他:“这是男的还是女的”?他说:“你看吧”,就把粉笔给我,我开始做鉴定工作了。在这个过程里,了解到很多骨架是无主的,这些无主的骨骼挖出来装到小棺材里就放到另外一个地方。我就把我到这里来看的目的跟老汉讲了,我跟他说我是干什么的,希望能用这里的骨架作标本。他说:“可以,你挑吧”。由于大多数骨头都酥了,不结实,最后就挑了两具拿回学校。

回来后就开始做标本。先对骨骼进行蒸煮消毒,将一些零碎地骨骼串起来。我记得有一件事情很有意思。有一次串一个脚,串了一大半,只剩下远端的趾骨还没串,就把这只脚装在裤兜里去理发了。理发时没注意,理着理着啪的一下那只脚就从裤兜里就掉到地下。理发员是一个 40 多岁的女同志,一看到就哇的一下跳起来大叫:“哎呀,死人”!我这才注意到,赶紧捡起来装兜里了。理发员躲得很远,高低不给我理发,说不能理,他把死人脚都装到兜里了。最后还是一位老师傅给我理的发,条件是将脚放到院外的窗台上。

这是我做的第一个人骨架标本,参考生物系的标本自己做出骨架,后来到工厂做把骨架挂起来的架子。从那开始上课就有骨架参考了,另外还有零散的,放到箱子里可以给同学来看。这个骨架现在上课还在用。

从这以后,只要条件允许就尽可能地去收集标本。有一次去内蒙调查,在一个剖面上看到一个墓葬的痕迹,而且脚都露在外面。当时挖出了“道光通宝”铜钱,是没主的。内蒙博物馆同志说这是近代墓,骨骼不要了。我说不要就给我当教学标本吧,洗了洗拿报纸包回来。再就是去博物馆做鉴定时,由于当时只要对骨骼鉴定的结果,不保存骨骼标本,我就跟人家要,说能不能支援我们,做教学标本,就这样也收集了一些标本。另外北京市文物研究所送给了我们一大批他们已经研究完的墓葬骨骼标本。所以现在 we 上课,有完整的和零散的人体骨骼标本,同学可以手把手的观察学习。

第二就是动物的标本。最早的一个动物骨架是 1956 年和裴文中老师带同学到赤峰林西实习时,由裴文中老师请客,宰了一只羊,把肉吃了骨头留下来,一只整羊的骨骼带回北京。

以后呢,就向有关单位请求支援。记得到云南去,就托在云南博物馆工作的学生帮忙买猴子标本。云南省博物馆的邱宣充、胡振东和李昆声等同志帮忙买了两个猕猴,处理完内脏后,撒上盐,通过邮局寄来。我们将骨骼做成标本。

另外在四川资阳发掘鲤鱼桥的时候,听工人说谁家的牛摔断骨头不能动,要宰了卖肉。

我们就跟主人说好了,宰了后你们吃肉,骨架卖个我们。这是一只很好的水牛,可惜的是牙口老了一些。我们在当地用机关食堂的大锅煮骨架,做成标本。1986年在金牛山发掘的时,在洞里有一只老乡扔的死狗。我们拿回工作站,煮、漂白、消毒,一个狗的骨架就做成了。

从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末,我们和北京动物园联系,请求他们支援我们建立一个动物骨骼标本室。我们的请求得到动物园领导的大力支持,委派兽医医院的肖方同志具体操作这件事情。动物园动物死后,经检疫合格的动物尸体,动物园都通知我们,由同学骑三轮车拉回来。就在当时旧石器考古教研室的小院里处理取回的动物尸体,架锅煮骨骼,清洗和漂白,最后做成骨骼标本。有时我们还打石器,用来开膛、剥皮、切肉,做试验考古学研究。近15年的时间,我们教研室的同志和历届研究生一起,自己动手,做了60多个动物骨骼标本,包括棕熊、狼、貉、麋鹿、河马、斑马、猕猴、河狸、豪猪以及鹤、孔雀和雉等做动物的骨架。动物骨骼标本室的建立对我们的教学起到很大的作用。我们讲授“动物考古”课程时,同学们看标本讲鉴定的知识,效果很好。

再就是石器的标本。上旧石器时代考古没有石器怎么能上好课呢。所以我们采取一些办法收集标本。一个是我们自己调查发掘的标本,收集在一起,编好号保管起来。另外是请兄弟单位支援。去年我们去百色参观,在地表采集到一些被雨水冲出来的石器,县里文化主管部门领导大力支持,同意我们将部分采集的石器带回学校做教学标本。另外湖南省考古研究所也送给我们一些他们研究后重复的采集标本。还有一批标本是关于欧洲的旧石器标本。这是裴文中老师在法国留学的时候,省吃俭用,省下钱买来的。这一批欧洲旧石器是从早期到晚期各阶段的典型石器、欧洲旧石器时代晚期艺术品的模型。北京大学历史系刚成立考古专业的时候,裴文中老师就亲口说这套标本就捐给北大了,希望能好好利用。这套标本很好,数量也挺多,也是国内唯一的一套欧洲旧石器标本。这也是最宝贵的一批标本。

除了上述三个方面的标本以外,我们还有一些特殊的标本,这就是研究生通过实验考古学做的实验标本。这里面就有一些关于大型食肉类动物啃咬骨骼的标本以及模拟古人类敲骨吸髓破裂骨片的标本,在研究旧石器时代骨骼的问题时可以进行参考对比。关于旧石器时代是否存在打制石器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议。在我国最早是裴文中先生和贾兰坡先生的争论,当时在《新建设》杂志上两位老先生发表不同的意见,一个人认为没有骨器,一个人认为有,争论很激烈。我记得很清楚,裴文中老师跟我们说,你们不要进入到争论里面来,关于是不是骨器的问题解决起来很复杂,不做实验很难说明这个问题。我认识到这个问题很复杂,到底是不是骨器应该根据老师的意见,要做实验,才能有发言权,不能空口无凭的发表意见。在56、57年我做点儿实验,用狗咬骨头,以后看这样做也不行,由于各种原因就放弃了。1982年指导研究生作这个课题,让研究生做。内容有两个方面:一个是敲骨取髓的实验,到市场买大型牛、马的骨头来敲骨吸髓,看破裂的骨头的特征;另一个就是到北京动物园收集老虎、猢狲等大型食肉类动物吃完肉的残骨,取回后煮、漂、清洗、晾干、编号和观察记录,看动物咬的骨骼的特征是什么样子。这个工作做了一年多,动物园也是很支持,收集了一大批标本。

我还指导我的研究生系统地做了有关石器制作和使用效率的实验考古学研究。内容包括砍砸器、刮削器、雕刻器、尖状器和细石器制作等。同学们根据遗址出土石器的特征,去野外采集石料,打制出各种类型的石器。再根据考古学和民族学的资料作石器的使用实验。如用石英岩砾石制成砍砸器,做砍树和砍竹子的实验,观察碗口粗的树要多长时间能砍下来,效果

如何,石器的刃口崩、钝如何?砍竹子的石器刃口使用特征和砍树的有哪些不同。用尖状器作穿刺和钻孔,雕刻器做刻划,刮削器刮木头、肉、皮子等试验,仔细观察和记录各种工具的使用效率,并用显微镜观察工具的使用痕迹。再有就是做细石器的打片技术研究,用直接打片和间接打片的方法打制细石叶。有一次学生上旧石器课,我们请研究生到教室来,给大家示范细石器的打制方法。他就坐在地上,两只脚稳住石核,右手拿石锤,左手握鹿角,一打一片,很熟练。最后再将打下的石片和石核复原。学生通过近距离观察打石器的过程,既引起他们的学习兴趣,也很容易理解和接受讲授的知识,反映很好。这些实验的结果和实验产品都专门保存起来,用于教学和研究,是十分珍贵的。

薛:从先生您毕业从事教育和科研的历程来看,我们初步统计了一下,除了1963~1971年那个特殊时期,您的求索一直未有停息,直到2006年9~11月您还参与了广西崇左生态园大洞的发掘,并考察百色地区旧石器地点。百色发现的旧石器,尤其是发现的手斧对于研究中西方旧石器文化的关系非常重要,您能讲讲您这次考察百色的看法吗?

吕:1973年10月,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等单位合作,在广西百色盆地进行古生物考察时,于上宋村发现一处石器地点。这是在我国发现手斧的最早的一个地点,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地点。文章发表了地层剖面图。并指出“大部分标本均由地层中挖出,只有三件标本一半埋在地层中,一半露在外面”(李炎贤、尤玉柱:“广西百色发现的旧石器”《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75年第4期)。但是广西自然博物馆赵仲如先生2004年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了一篇“百色旧石器改写人类进化史”的文章,他说在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和广西考古队调查的时候,地方上只有他一个人参加调查。据他的野外记录和回忆,他这样写道:“21日到上宋村一带观察地层并寻找脊椎动物化石。在上宋村西南约300米的右江堆积阶地上出露的均为第四纪的地层,没有发现化石,所以大家都跑得很快。他和大伙的距离拉得很远,但是他还在附近寻找。他在一条小而浅的冲沟里发现了几块打制石器。向周围一转,又找到了几块。于是他就喊:‘尤玉柱、尤玉柱,这里发现石器啦,快过来看呀!’”已经跑出一二百米的尤玉柱听到叫他,立即跑了回来,其他同志也过来了,一看果然是石器。于是他们又在四周寻找,又找到了几块。这次在盆地西南的上宋村首次发现的11块石器全部脱离了地层,均为在地面捡拾的,而无一块是从地层中挖出来的。当时他将石器塞满了背包,装不下的由尤玉柱带着。到百色县城,他们在百货店买了两个装洗衣皂用的小木箱,装好后全部带到了北京了(《自然》2004年第4期)。

根据赵仲如先生的回忆,必须指出的是,上宋村11块石器全部脱层,为地表所捡,不是在地层中挖出的,这一点应予更正。我们知道,脱层的标本和在地层中挖出来的标本在研究时是大不一样的。尽管当时上宋村还没有提出关于手斧的问题,但是后来几年中发展很快,在百色盆地又发现很多的手斧,因此引起了学术界的争论:有人同意是手斧,有人不同意,目前可能还在争论之中。所以作为第一个报道地点的材料来源很重要,一定要尊重事实,对以后研究很重要。

第二个问题是争论多年的手斧(hand-axe)问题。我印象中,大约是在二三十年前我在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里黄慰文同志的办公室里看到他从广西百色带回来的十几件石器,其中有几件石器,无论是形状、制造方法和使用功能上看,都和欧洲的阿舍利手斧接近,甚至完全一样。最近几年,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配合基建任务,在广西百色发掘,又发现了很多手

斧。我去年有幸到广西工作,在崇左发掘一个洞穴。工作结束后,承蒙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领导的照顾,加上研究生和老师5人,到百色地区参观,参观了田东、田阳地区一些地点,最后到了百色。也见到了百色以前由曾祥旺同志采集的大批石器。看了最近几年出土的石器,确实很丰富。还参观了广西自然博物馆王颀同志采集调查和发掘的手斧。给我总的印象是,这批东西很特殊。但是和真正的欧洲旧石器时代较早同一阶段的阿舍利手斧相比,还不完全一样,而象时代更早的阿布维利的标本。我以前对手斧问题一直没敢表态,去年看到了这批广西的石器,就有发言权了。所以在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座谈会上,谈到了我的一点个人意见。在我们观察的石制品里,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手镐,一种是手斧。但是总的说这批石器和欧洲的手斧不完全一样。如果叫它为手斧也不是不可以,但是其内涵和欧洲阿舍利不一样,最好把它叫做“百色手斧”或“中国手斧”。这样它既有手斧的含义又和欧洲手斧不同。在其他地点发现的材料,如丹江水库地区、陕西洛南发现的也可以叫手斧,但要说明与典型手斧区别在何处。我觉得这样还是比较好的。

薛:香港黄地峒遗址是最近旧石器时代考古的重要发现之一,但有不同的意见。您2006年去考察过这个遗址,谈谈您对这个遗址的看法。

吕:2003年春天,香港的商人到黄地峒沙滩钓鱼,他发现身旁有好多的石头,这些石头不带棱角,也不是被磨过的卵石。好奇心驱使他带了一些石头回去,把这些石头交给了香港考古学会。香港考古学会就带着其中一些石头到了广州,请求广州中山大学岭南考古研究中心鉴定。鉴定结果认为这些是人类打制的石器,时代约为旧石器时代晚期。2004年11月底到2005年1月,中山大学岭南考古研究中心和香港考古学会组成联合发掘队,开始对该地点进行调查发掘。

遗址位于香港西贡半岛的北岸,南北长约300米,东西宽约150米,出土及采集的石器共3261件,数量很大,石器种类也比较丰富。调查组在黄地峒山的西坡挖了几个探沟,其中一个深度达2米,地层可分五层,再往下就是基岩了。在第3层、第4层和第5层都发现了一些石制品,第三层的光释光测年数据是6800年,第四层是39000年,第五层是35000年(香港深涌黄地峒遗址试掘简报,《人类学学报》25卷1期,2006年)。

发现如此重要,当然要开记者招待会了,在会有北京专家组的成员说,港府没有认清遗址的重要性,现场保护不足,建议港府尽快划定遗址的保护范围和保护技术。另一位参加调查工作的国家文物局专家组成员指出黄地峒遗址已出土的器物达7000件,较福建、台湾、海南、浙江等东南沿海旧石器文化遗址出土的石器总和还多两倍,而且石器工艺也独一无二,是近二十年来东南沿海和岛屿史前考古的最重要发现之一。另一位科学院的院士表示,考古学界对旧石器时代近海居住的人类认识不足。黄地峒发掘地点只有16米²,当局应投资扩大发掘面积至数百平方米,打开以海为生的中国人的生活面貌。这次会议确定了黄地峒遗址的重要意义,在各大报纸上,如《东方日报》用大标题登出“黄地峒遗址,港府不当宝”,学者认为港府对西贡黄地峒的保护和认识均不足。

国家文物局专家组的成员说,这个遗址位于西贡黄地峒,是一个距今35000年到39000年的旧石器晚期石器制造场,面积达8000米²,迄今已出土了6000多件器物。从对石片石器的发掘情况看,过去北方的发掘都以小型器物为主,而此处则以大、中型为主,一些有代表性的器物如长方形的镑形器,在旧石器时代考古中还从未发现过。

2006年2月15日的《快周刊》则认为黄地峒遗址是三万年前的兵工厂,所以大标题是:三万年兵工厂,香港震全球。《文汇报》的大标题“西贡黄地峒考古震天发现,6000件石器改写历史,将香港人远祖推至近四万岁。”新华网2006年1月14号说,国家文物局专家组的成员说,黄地峒石器在加工工艺和石器组合上都有自身的特征,这是一个全新的组合,在香港、珠江三角洲甚至东南沿海都是绝无仅有的。《大公报》的标头是“西贡旧石器遗址证实港人历史三万五千年”、“黄地峒遗址筹资掘宝,可成为世界性试验考古学基地”。《东方日报》2006年1月15号的报道是“不懂珍惜黄地峒,慎防遗迹变遗憾”。《东方日报》2006年的考古专版的标题是“旧石器遗址改写港历史——西贡掘出6000石制品,十大考古新发现”。各大报纸的呼吁,给港府考古领导单位造成了很大的压力。

关于黄地峒的发现,在香港有两种意见。一种以岭南考古研究中心和香港考古学会为代表,认为黄地峒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采石场。而另外一些学者,如香港古物古迹办事处的同志认为,这个遗址因为是坡积,地层都很薄,测的年代不一定准确,石器也很像香港沙下遗址发现的一些新石器时代遗址的遗物,因此不认为它是旧石器时代的遗址。争论很大,但国家文物局的专家组给出了结论,说是一个旧石器时代的采石场。

去年(2006)3月,我在香港工作的学生到北京来看我,我们谈起了黄地峒遗址的情况。他说,这个问题还在争论,问我想不想去香港看看。4月份,我抽出了时间,与黄蕴平和夏正楷老师一起去了香港。我们去考察黄地峒遗址的时候他们正好在发掘,已经挖到基岩,清理出了以前发掘的情况。从剖面看,地层没有划错。另外,香港大学正在做光释光的采样工作,他们用不锈钢管水平的打进地层内,是按正规的采集方法做的。我们又看了以前采集和发掘的石制品,觉得它们缺乏旧石器的特征,而具有新石器的特征,尤其是铈形器,其中几件有沙下遗址器物的痕迹,局部好像有磨过的痕迹,但不清楚。因为我们对香港的新石器不是很熟悉,地方上的同志就给我们介绍了当地新石器的情况,他们的意见也是黄地峒石器属于新石器时代。前面国家文物局的同志说过,铈形器在中国旧石器时代遗址中还没有发现过,因此我们从器形来看,认为黄地峒石器属于新石器时代。专搞海陆变迁和第四纪地质的夏正楷教授认为,从地貌来看,时代也不会很早,应属于新石器时代。这就是我们关于黄地峒遗址的看法。

最后我们了解了以前的工作,认为采集光释光样品的方法不是很合适,他们使用易拉罐去了盖代替钢管打进地层采样。关于光释光的样品有种说法叫“见光死”,一见到光样品就没用了。根据他们的报告,第四层是39000年,而第五层是35000年,地层出现倒置,倒置的原因还不清楚。这个地点是坡积的,坡很陡,在发掘点以上更高的地方有基岩,人们就在这里开采石器原料,因为山坡很陡,开采的石片都滚到山脚甚至海滩。时间一长,遗物就很多了。

另外,从发掘的情况来看,他们是按人工层发掘。我个人的意见是,黄地峒遗址坡度很大,不适宜采取水平层的发掘方法,因为地层是斜的,很容易将地层中的遗物弄混。而且在根据水平层发掘的记录恢复到自然层的过程中,一旦不够准确,就容易搞混,给研究带来很大麻烦。他们发掘的面积不大,长2米多,宽1米多,其实完全可以按原来的层位发掘。综合看来,他们的发掘方法是存在问题的,是不是会直接影响到测年呢,这就不好说了。

薛:您认为我国旧石器时代考古目前存在的问题是什么?

吕:第一是从事旧石器时代考古工作的人少、力量较弱。也就是说,我们国家这么大,每个省都应该有搞旧石器时代考古的工作者。没有人搞就不会有什么发现。比如说湖南省以前

没有人搞旧石器,一直没有发现旧石器。自从我们培养的研究生袁家荣回到地方后,做旧石器考古调查,很快就有发现,而且越发现越多,越发现越重要。过去古脊椎动物和古人类研究所与北大也办旧石器考古短期训练班培养人才,但回去后有的就搞别的不搞旧石器了。我国从事旧石器考古的人员很少,全部加起来还不到一百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应该引起有关单位的重视。

另外,就是关于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中对石器分类和描述的术语问题,不仅不统一,而且很混乱,这个问题已经存在几十年了。我记得很清楚,在编写大百科全书“中国旧石器时代”的时候,贾兰坡先生是主编,我是副主编。文章由有关专家撰写。但因为这些问题没有解决,器物的叫法都不一样,在描述时名词也很乱。当时我就建议,能不能使用统一的名词。器物分类也是这样,争论的问题也很多,但直接写文章讨论这个问题的却很少。最近几年,故去的李炎贤同志提出了术语的一些问题,卫奇同志也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这些都是好的事情,对促进解决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中长期困扰的问题是大有益处。

我认为旧石器的分类主要是从使用功能来看,砍就是砍,刮就是刮,钻就是钻。另外我们的分类应该考虑到中国文字的特点。现在有人完全依据外国的分类,如薄刃斧,我们知道器物刃口的薄、厚与使用的功能和对象有关。刀刃薄、斧刃厚,因为要砍。既然要分类就应该按着中国的特点考虑,不应仅把国外的名词翻译过来就行了。所以我的意见,旧石器分类不用那么复杂,可以按照功能(使用)来分类。我们现代人根据工具的使用情况分类,如菜刀、苹果刀、西瓜刀……。但即便在今天工具分类明确的情况下,也不是一个工具只一个功能,一个小刀也可以切开西瓜。古人更是如此,所以不要把类型分得那么复杂,人为地搞乱套了。我觉得术语应该统一,而统一也是很难的一个工作。建议最好请众望所归的单位来做这个工作,如在第四纪下面设有的旧石器时代考古分会可以组织全国搞旧石器的同志,集中在一起,讨论和研究这样的问题,把名词规范化。

从目前的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来说,并不是很景气。在十几年前,地方开展工作比较困难,主要是因为没有经费。但是现在情况有大的变化,经费不成问题,但人员很少。我认为年轻同志一定要认真学习和勤奋工作,把旧石器时代考古的重担担负起来,就是说在身体好、尚年轻的时候,多下田野,不要贪图坐办公室,多接触第一手资料,对以后的研究是很有好处的。当然要做好业务,首先要学会做人,做一个诚诚实实的人、老老实实的人。你尽管业务好,但专业思想不巩固,出去后就不干这个了,那你有再好的业务也没用。另外,对一些学术有争议的问题,不要受老先生影响,要有自己的看法,而非人云亦云,也不能太盛气凌人。所以我们年轻人首先要学做人,然后把业务踏踏实实的搞好,一就是一,二就是二。

薛:恭祝先生健康长寿,并有更多的考古学研究成果问世!谢谢!

(责任编辑:周广明)